

古文字是如何被识别出来的

■ 减 —

自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一百余年出土的甲骨文片数不胜数,在地域上横跨河南和陕西,在时间上则贯通殷商至春秋时期。面对如此久远的文字,我们如何认出它是哪些字呢?其实,关于古文的鉴别,早在西汉时,就已经有一些独特的方法了。而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什么是古文字?是不是以前的文字都能叫做古文字?

什么时候的文字能称之为古文字

一般而言,中国的文字体系主要为楷行草隶四种,这四种久的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大体上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其中的书法会随着时代的变动和个人书写风格的差异而有所不同。而在这四种书之前,则是被人们称为甲骨文和金文的文字,在先秦时期,迫于书写材料的限制,人们的文字表现出和后来文字截然不同的特征。由于秦代前后的文字相差实在太,我们便把秦以前的文字定义为狭义的“古文字”。

这些古文字大体上来说都是各具特色的,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甲骨文,我们认为随后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是大体上沿袭自甲骨文的,而除此之外,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文字又有所不同,其中以南方的楚国文字为代表,其文字特征和中原各国的文字相去甚远,但却仍然可以看到

古文字的鲜明特点。虽然说这些丰富的古文字形态各异,但它们所遵循的文字规律却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能分辨出许多古文字的重要原因。

“六书”造字与古文字的断代

“六书”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周礼》,东汉许慎在其著作《说文解字》中将“六书”归纳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这所谓的“六书”,其实就是汉字的构造方法,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造字方法。

我们说古文字虽时代久远但仍能辨别,便是因为其构造方法与“六书”一致,我们便可以通过这六种方法,从文字本身出发,对文字进行分析和判断,其中最为简单的便是一些数字和最常用的字。“一、二、三”自不必说,最简单的横线计数相当容易判断,而“日”和“月”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象形字,其文字的象形意义一直沿用到今天。

这些容易判断的字终究占少数,有许多较复杂的文字,我们又是如何判断的呢?关于这个问题,西汉的一位学者给了我们启发。

然而,在此之前,令人们困惑的是,为什么秦代以后文字巨变,西汉的学者还能在古文字方面有所贡献?这就要从《尚书》说起,由于秦汉交际之时局势动荡,加之文字统一和众多书籍的焚毁,许多书籍失传,而《尚书》藏于孔壁之中保存了下来,然而这《尚书》却是用古文写就,后人又如何传承下这一经典呢?这就要提到西汉经学家孔安国,他师《尚书》自伏生,凭借自身对尚书的记忆和理解将孔壁中的《尚书》用隶书写就,这种方法被称作“隶定”。

“隶定”与溯古

这种“隶定”的方法是建立在古今文字一脉相承、联系紧密的基础上的,通过孔安国的这一行为,后来的古文字学者们用楷书笔法摹写古文字,经过长久的发展,如今的“隶定”成为了“破译”古文字的最直接的方法。而“隶定”这一方法没有一个确切的标准,李守奎先生将其大致分为笔画隶定法、偏旁隶定法、字形转换法、综合隶定法、音意转换法五种隶定方法。

通过这些隶定方法,我们对古文字的了解愈发深入,不只是一些简单的字,那些字形清晰的字也得以辨认。然而,古文字之复杂,不仅仅是复

杂在字形,而在于其会分化,如“它”字,隶定起来十分简单,而其实际含义是“蛇”,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许多文字已经改变了原来的含义,又有许多文字出现以表达不同的意思。这些文字的辨别,已经不是古文字研究者们闭门造车可以研究出来的了,随着其他学科的学者、知识和研究方法的进入,古文字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古文字研究者通过综合各学科的知识来帮助判断。

众多学科的助力

在人们看来,古文字学这门学科与历史学关系紧密,事实也当然如此,古文字学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们加深对商周历史的了解,历史学也可以为古文字的辨认提供帮助。前文提到的孔安国的《尚书》复原就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在一些较晚期的古文字中,包含了众多典籍,这当中又有许多流传了下来,我们通过今天保存的典籍和古文字的材料一一对照。然而这种方法也有其局限性,毕竟古时候的典籍流传至今,没人知道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古今对照有所出入也是在所难免的。

于是考古学的发展便为古文字学的发展助力,随着众多汉简的出土,我们掌握的古籍材料的时间跨度大幅度提高,这一方面有助于今天补充完善经典,另一方面有助于辨认古文字,毕竟相较于今天的典籍,汉代的竹简更加接近那个时代,其变动也少得多,可靠性高出许多。

不管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的帮助,大多来自文献方面,文献的对照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文字的运用,归根结底是表意,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说,语言学等专业的专业也有所帮助。在那个年代,书写难度是比较高的,所以书写者需要通过尽量少的字数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这就需要语言学家的帮助,通过大量的对比分析,我们能从中找到固定的模式,也能发现一片甲骨上不同的分区有不同的作用,这就为我们辨别其中文字的意思降低了难度。

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我们认识到了三千年前的文字同样有着独特的、别样的魅力,这种文字的构造方法,也延续了数千年,这体现了中华文化及中国文字的源远流长,也体现了绵延不绝的历史传承,这种传承体现在方方面面,自然也包含文字,我们才得以以今窥古,得窥其貌。

广州考古发现大规模高等级越人墓地

新华社广州电(记者 邓瑞璇)记者近日了解到,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对广州黄埔的陂头岭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取得新发现。其中的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的墓群是目前岭南地区发现的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封土保存最为完整的高等级越人墓地。

陂头岭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中新广州知识城。2016年至2017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陂头岭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2020年10月中旬起,

再次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截至3月底,完成考古发掘面积约4000平方米,清理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5座、窖穴和灰坑260个、柱洞70个、沟槽1条,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初期墓葬38座,共出土文物400余件(套)。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易西兵介绍,根据考古发掘成果,可以明确陂头岭遗址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和战国中晚期至西汉南越国早期两个阶段的文化遗存。

陂头岭遗址墓葬目前确认38座。

易西兵介绍,地表有相对高大的封土、墓葬顺山体走势排列、墓穴埋深较浅、墓坑底铺石床等特点具有明显江浙土墩墓的遗风,反映出强烈的越文化的族属特征。而部分大中型墓葬的棺椁设置又可见到岭北楚文化的影响,反映出楚越交融的态势。

新石器时代晚期居住生活类遗存包括窖穴、灰坑、柱洞等数量众多的遗迹,也有少量墓葬。储藏性质的窖穴值得关注,目前已确认48座。据介绍,这是目前岭南地区考古发现的规模最

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窖穴,可见当时陂头岭先民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物产储备的丰富程度,对研究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早期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社会发展阶段等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本次考古发现为探寻秦定岭南之前的古番禺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于珠三角乃至岭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南越国时期的历史文化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尤其为重构岭南早期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易西兵说。